

## 兩岸社會科學著作翻譯論壇

主持人：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賴慈芸教授

與談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王志弘教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叡人副研究員

群學出版社劉鈞佑總編輯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顧忠華教授

時 間：2014年11月21日

地 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10樓國際會議廳



圖 1 2014 年臺灣翻譯研討會：人文社會學術著作翻譯——「兩岸社會科學著作翻譯論壇」，主持人賴慈芸教授（中間）以及全體與談人：吳叡人副研究員（左一）、顧忠華教授（左二）、王志弘教授（右二）、劉鈞佑總編輯（右一）。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 壹、前言

由於臺灣學術書籍的市場規模不大，兩岸又皆使用中文，因此多年來臺灣學院內外經常可見大陸出版的社會科學翻譯著作。但因兩岸政治制度差異甚大，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的闡發，不宜交由大陸譯作主導。因此今年一月，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了第一屆「人文社會學術著作翻譯工作坊」，結合社會科學與翻譯專業，希望能培訓出適合翻譯社會科學書籍的譯者。參與的研究生有40人，反應熱烈，目前已在翻譯的書籍有6本。

本論壇所舉辦的目的就在於延續這樣的討論。我們希望了解以下幾個問題：社會科學使用簡體字譯本的疑慮，以及臺灣依賴簡體字譯本的情況如何？臺灣的社會科學翻譯著作品質如何？和大陸相較之下，有什麼優缺點？社會科學的譯者，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以及對產官學界的建議。

## 貳、與談內容

### 一、第一輪討論



圖2 賴慈芸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賴慈芸教授（以下簡稱「賴」）：臺灣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我們是一個小國家，卻使用了一個世界上大宗的語言。照理來說小國在文化資源上是會依賴大國的，比如說在加拿大就很難想像不能看美國譯者翻譯的書。同樣地，臺灣在戒嚴期間雖然名義上禁止大陸的翻譯，但實際上當時有四成到五成流傳的翻譯作品是來自大陸，可見臺灣依賴中國大陸並不是今日才有的現象，但我們對於此現象應該有所警覺。

首先，中國大陸的體制跟臺灣不一樣，在社會科學上他們直到1978年之後才開始這方面的研究，臺灣起步較早。再者，社會科學的書籍依賴大陸的翻譯，他們的審查、意識形態、選擇書的方向等，有各種危險性，若我們沒有警覺心，後果堪慮。今天邀請到在座的幾位老師分享兩岸社會科學翻譯著作上的相關經驗，對此又該抱持怎麼樣的態度？若我們必須使用或依賴中國大陸的相關譯著，該如何因應？這是本論壇所要探討的主題。

## （一）從《想像的共同體》中國大陸出版經驗談起

### 1. 《想像共同體》譯本二度遭刪節的情形

吳叡人副研究員（以下簡稱「吳」）：我曾因為機緣而翻譯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所著之《想像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後來成為學術暢銷書。《想像共同體》最初於1983年出版，到1991年時增加了兩個章節，出了增訂版。臺灣的中文版本（也是世界第一個中文版本）是依照1991年的版本翻譯的，總共有11章。我翻譯時寫了一篇導讀，把作者的背景和這本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稍微整理了一下，另外也寫了一篇譯者後記，說明自己翻譯的心路歷程。當時我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時報出版社和我說中國想購買版權，出版簡體字的版本，因為安德森教授堅持只能有我這個譯本，所以希望將臺灣版改成簡體字流通大陸即可。

不久後我收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第一版的簡體字版本，竟發現我寫的導讀少了最後的三段，被刪除的部分是這本書在臺灣脈絡下的啟示。此外，第九章〈歷史的天使〉也被拿掉了，裡面嘲諷鄧小平、周恩來和毛澤東等所謂社會主義的革命家，在革命成功後還是繼承了舊政權體制以及民族主義的形式，藉此來說明民族主義的強韌。《想像的共同體》第一章提出本書的問題：為什麼中國、越南和柬埔寨這三個主張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會為了民族問題發生戰爭？

其後各章就嘗試解答這個謎題，第九章做出總結，討論中國共產黨回歸民族主義的形式。這是一個完整的起承轉合的結構，刪掉第九章等於刪掉「合」的部分，所以讀起來就不知所云了。在譯後記裡面，關於我自己在海外苦學，徘徊流浪在不同學科以及臺灣史、日本史、西洋史、中國史之間的經驗，其中「臺灣史」三個字也被刪掉了。這樣的刪節，等於刪掉了身為譯者的我的專業（臺灣史）與故鄉（臺灣）。

安德森教授在2005年增加了一個新的章節，討論這本書如何被翻成31種語言、在33個國家出版的過程，而在不知不覺中《想像的共同體》的原著和其31個譯本形成了一個有趣的「想像共同體」。這一章有趣之處在於從「後設」(meta) 觀點，觀察這本書如何在世界各地被流傳，並介入每個地方的政治、歷史與現實發展。安德森因厭惡自己的作品被更動，在這一章裡就提到了臺灣版的事情，以及我的博士論文關於臺灣民族主義的想法，而後批評時報出版社毫無譯者吳叡人那樣的正直(integrity)，更提到此書在舊版本是如何被刪的。這段內容被加入後，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擴張成長，決定要繼續出版新的版本，然而他們依然針對敏感之處做刪節，這次雖然保留了第九章，但還是把針對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的部分拿掉。對於安德森新寫的這一章，則刪掉了文中提及我的論文主題，也就是臺灣民族主義的段落、對我個人的肯定，以及對上次刪改事件的強烈批評。以上是我的翻譯二度遭到刪除的情形。

我相信中國大陸的讀者若只依賴這樣殘破的版本是無法完整了解作者的原意和論證的，他們對當代民族主義的認識將會是殘缺的。當大國崛起，知識應作為文明的衡量尺度，而不是被刪節掩蓋。翻譯是一種言論思想的創造，言論思想的自由是其前提，在談論中國大陸各種學術著作以及其翻譯的品質之前，我們應該系統性地去研究中國的審查系統(censorship system) 是如何在運作。

## 2. 閱讀中國翻譯作品的經驗

中國大陸在80年代開始走向世界的自由化時期，以及90年代都有大量的出版譯作，我對於中國大陸翻譯以量取勝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大量的翻譯作品當中，涵蓋了廣泛議題的相關譯作，尤其是從歐洲語文原著直接翻譯過來的作品，這一部分我認為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中國譯作品質上參差不齊，有不少英文譯本的二手翻譯，以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好與壞的差距非常大，且壞的居多。無論中國大陸的翻譯人才有多少，有些東西是無法量產的，必須從根本去理解西方文明，這需要特別訓練專業人才，要一、二，甚至三個世代的累積。翻譯需要花費很大的心力，且要做很精緻的解讀以及文字的轉譯過程。此外，我在臺大政治所任教的經驗是，臺灣學生英語閱讀能力仍有所不足，所以他們時而會仰賴如「結構群」書店等所引進的簡體字譯本，這裡面想必會有許多問題。

賴：我覺得從經驗的出發會是很好的開頭，可以告訴我們依賴大陸的翻譯有多危險。據我所知希拉蕊的著作在中國也有被刪改的情形，這肯定不是少數的例子。

### （二）臺灣社會科學著作翻譯的「小而美」優勢

顧忠華教授（以下簡稱「顧」）：談翻譯最大的問題在於是否很忠實地去翻譯，或是後面有沒有政治制度影響到翻譯的品質。在中國，對某些文字的遮蔽是因為意識形態，是政治主導對思想的控制。近期列舉出「七不講」，包括「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錯誤歷史、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皆會影響到翻譯的品質。

從這個角度來區辨，臺灣最大的優勢就是保有自由，自由給予我們調整的機會，使我們對社會科學理念的詮釋能具深度及廣度，去理解西方文化、西方學術的現代性(modernity)。臺灣能抓到現代文明最基本的

質素，因為我們能自由地做各種討論，並經過這樣翻譯上的文化交流去創造一個更好的、綜合性的人類前途。

然而臺灣翻譯的劣勢就是人口、市場太小，出版業辛苦，翻譯也會受到影響。此外，臺灣在制度上自我設限，不懂得自身的優勢在哪裡，白白流失了掌握「話語權」、「詮釋權」、乃至「主導權」的機會。譬如臺灣的學術評鑑一味獨尊 SSCI，長期下來，不僅傷害中文發表的「尊嚴」，同時也令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喪失殆盡。即使如此，臺灣的學術界對於諸多議題的探討，往往還是呈現出較為深刻的反省，翻譯作品的「對話品質」也有一定的深度，這就是突顯了我們不必妄自菲薄的最佳註腳：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地不在廣，人不在多，有自由則靈！

賴：我個人的經驗是，中國大陸面對科普翻譯比較沒有刪改的問題，我有一本關於城市規劃的翻譯書賣給北京，一個字都沒刪，但在社會科學的部分翻成簡體字就極有可能遭到刪改。

### （三）學術翻譯的症候與病理



圖3 王志弘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王志弘教授（以下簡稱「王」）：翻譯主要是語言意義的轉譯，但翻譯也是跨界的行動，所涉及的邊界是複雜的社會政治疆界。標題內的「症候」在此指的是文化衝突造成的緊張，翻譯之所以是一個症狀，就是因為它透過某些焦慮或特定欲望來展現，如超英趕美的想望。翻譯是一種實踐政治和斟酌倫理的途徑，因為在翻譯時，我們總是預設了一個翻譯的對象。不只是一要翻譯我們和預設的他者之間不一樣的地方，而且我們還認為這個他者有一定的價值；也就是說，

我們透過翻譯來表達對他者所創造的意義的尊重。這裡也和「跨界」有關，因為我們這時候是在斟酌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關係——例如，我們和中國大陸之間存在著創傷、衝突，但也有著合作與其他的可能性，這樣的倫理關係有多重的政治意涵。因此，翻譯不只是一個關於譯者的課題，它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一種存在狀況、一種操作能力。所以，最後我會提到，我們要與翻譯這個疾病共存。

我今天會受邀前來，可能是因為我有三重角色。首先，我是翻譯工作者，大概譯了四十餘本書；其次，我也算是學術翻譯的研究者。另外，教學方面，我也是學術翻譯的使用者，主要是在社會學、發展研究、性別研究、環境規劃與設計、人文地理這幾個領域，累積了一些教學的經驗。然而，翻譯常常被看成是一個次等工作。二十年來，經常有師長惇惇告誡我，不要一直做翻譯，應該專心做研究。此外有些人對於學術翻譯抱持懷疑的看法，像經常有人說，我從事翻譯是普渡眾生，但有時候反過來其實是暗示我在誤人子弟。但樂觀一點來看，東海大學的趙剛教授曾經翻譯一本談1968年學生運動的書，他在序言裡有一段話，我引出來：「法國1968年的街頭英雄要透過我的中文翻譯，讓他們成為中文世界的集體知識與記憶的一部份，讓1968年成為台灣本土的一部份。」我從事翻譯，感到懊惱或氣餒的時候，有時候就會想一下趙剛老師的這段話。

翻譯在知識落後的國度，是追趕式發展的一環。然而，這也引發了學術翻譯的一些爭議：到底翻譯成果是本地產品，或全然是舶來品？到底是原創比較厲害，還是我們必須要通過模仿、通過翻譯來展現第三世界的抵抗？或者，翻譯其實還是呈現了核心國家的文化殖民？當然，仔細來看的話，不是這麼簡單的二元對立；翻譯的實作並不是照搬，而是有所轉化。知識的引進不是全盤模仿，而是有其本地的內化和消化方式。

回到學術場域，以我將翻譯看作社會行動的觀點來看。早年臺灣在邁向現代化的時候，社會科學界的許多領域，皆通過翻譯引進了西方角度來看臺灣本地的現代化經驗。在這樣的體制裡，翻譯活動比較像是在

鞏固既有學術場域的規範。1980年代晚期解嚴前後，則有大規模、壓縮性的引進西方批判性的學術思潮，在這裡面，翻譯扮演著重要角色，比如女性主義、批判的地理學和都市思想，當時都仰賴翻譯的引進。

另外，我們若將翻譯看成一個知識生產場域，它還牽扯到政治場域當中，國家機器的控管、審查、補助，學術場域內部知識正當性的爭奪，包括場域內的權力關係，有一些涉及文化資本、象徵資本的鬥爭。從出版市場的場域來看，有時候是資本利潤的邏輯，有時候是跟國家之間的審查和資助關係，當然也會對應到學術著作消費者的閱聽和回應。就學術出版市場而論，據說目前很多民間傳統學術出版社搖搖欲墜，相對的，這幾年我們看到大學的出版社或出版中心的崛起，像政大、臺大的出版中心，除了出版專書以外，也開始有些翻譯，從日文、法文等翻譯過來。大陸書籍的數位版本極易取得，也對臺灣造成了威脅。過去十幾年來的大學擴張，曾經一度讓大家以為，學術書籍的消費人口大增。但實際觀察發現，購書者比例卻大幅減少。現在的學術走向國際化，也越來越重視期刊，似乎直接念英文期刊才是王道。但是，翻譯的必要性難道就因此降低了嗎？

#### （四）對於學術翻譯，國家能做什麼？



圖4 劉鈴佑總編輯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劉鈴佑總編輯（以下簡稱「劉」）：群學出版社過去和大陸的出版社有些來往，他們常詢問能否將我們的繁體翻譯賣給他們做簡體版，我們通常會答覆兩年後再來，以避免簡體版引入臺灣對繁體版的銷售造成影響。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只成交了一本書，而尚無向他們購買的紀錄。但其他出版社和中國大陸出版社之間的繁簡互售的情況已經相當普遍，甚至變成重要財源。

如果不互售就會形成繁簡交鋒的狀況，有時是良性的互動，比如說我先前與張君玫老師合作翻譯的《社會學的想像》，大陸後來也出了簡體版，他們承認曾經參考我們的譯本。另一種情況是，我們有一本翻譯《社會學動動腦》，這本書我們很早就翻了，但是對岸翻譯後（兩個禮拜後我們的繁體版才出版），一下子就傳了過來。即使如此，其翻譯品質不佳，被他們自己人在《豆瓣讀書》上批判得很慘。不過後來大陸那家出版社不惜重金禮聘名家重譯，總算給了讀者一個誠懇的交代。交鋒的過程慘烈，但結果是好的。

大型的學術出版社往往有自己的通路，自己建立專門跑學校的團隊，甚至擁有自己的校園連鎖書店，對於外面的「店頭市場」（即銷售大眾暢銷書的書店），依賴度並不高，而形成一個自足的體系。即使後來連鎖書店及網路書店崛起，自足的程度仍相當高。群學出版社則沒有自己的校園營銷團隊，而是透過店頭和校園通路銷售。一般大眾暢銷書出版社以前多少都會有文化知識系列叢書的路線，不管是為了形象或文化理想，但現在因為景氣不佳幾乎都撤光了。學術出版社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教科書，以前每年有兩個旺季，但現在幾乎全部都是淡季。學生的自主性越來越高，教科書不再是收入的保證，經營逐漸出現問題。群學的教科書比例不高，但因為也跨在外面的店頭市場上，不免也被捲入大眾暢銷出版社所面臨的折扣戰，利潤漸少，同時經營模式也受到衝擊。大眾暢銷書的經營主要是以衝量（即暢銷）為主軸，而學術性出版社則是以「長銷」為命脈。前者新書衝到一定時期後，如果變成了又暢銷又有長銷的潛力就保留下來繼續出，如果不行就絕版，而學術出版社本來印量就少，要靠長銷才能獲利，因此儘量不做絕版，但也因此倉儲的壓力越來越大。被捲入大眾銷書的經營模式還有一個後果，因為大眾暢銷書的衝刺焦點是新書，有點年紀的「老」書乏人聞問，譬如網路書店的宣傳版面全被新書佔領，本來以長銷為主力的學術出版社所具有的長尾效應就被橫空斬斷，再加上現在教科書的銷售也出現頹勢，學術出版社

的生存危機已經觸目可見。

## 二、第二輪討論

### (一) 翻譯在於知識與社會階層流通的重要性



圖5 吳叡人副研究員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吳：我們活在一個很需要翻譯卻對翻譯不友好，原創性以及人的心智和努力都在急速被貶值的年代，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得去做，為什麼？

中國過去一、二十年來很流行李奧·史特勞斯 (Leo Strauss)，他是50、60年代芝加哥大學很有名的思想史學者，把歐陸精讀原典的閱讀方式帶到美國，創造了北美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當中的細緻閱讀原典，也就是精讀 (close reading) 的傳統。他有一本書叫做《迫害與寫作的藝術》，書中描寫中世紀西方因為宗教和政治因素，政治思想的表達處在一個嚴厲的審查體制之下，若想要坦白表達一些意見只能用隱姓埋名的方式，即使在很遠的地方（如相對較自由的阿姆斯特丹）發表，也要寫的很隱晦。史特勞斯提醒我們，要細緻地去閱讀這些作品字裡行間被壓抑的、沒有講出來的東西，所以他提出一個概念是 esoteric reading，意思是很神奇的閱讀方式，有時候在那個脈絡底下你必須用這種方式去理解這些作品。

中國學界今天迷史特勞斯，更早以前迷卡爾·史密特 (Carl Schmitt)，對於引進世界新的各種理論不遺餘力，可是引進來的方式都很奇怪，因為他們把卡爾·史密特的理論引進來是為了鞏固中國的國家主義。相反地，他們就不引進史特勞斯《迫害與寫作藝術》的那本書，因為那本書完全可以用來對照和理解中國。從這裡我想引申到我第二個觀察。

中國一方面看起來和世界如此整合，另一方面又在如此嚴密地過濾世界，結果創造出一個存在於現實世界之外的一個「中國的」平行宇宙。然而國家的介入、過濾和干預而形成以簡體中文為主體的「世界像」是什麼？這讓我非常好奇。中國國際政治有一個新的理論叫「天朝主義」，沿用傳統「天朝」所謂「近悅遠來」的概念，主張中國「和平崛起」，自認文明豐富，於是外界自動過來，心悅誠服。如果從翻譯的審查去看它引進來的、容許被創造出來、被建構出來的一個世界像，可以觀察到中國在世界位置的自我期許——它想崛起並站在世界的核心位置。在如此與世界緊密交流之下，中國創造出一個符合國家利益，並且脫離現實的世界像，這件事情令人感到焦慮。

此外，中國很多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們活在一個雙重的現實當中。一方面他們透過原文去讀世界的經典，卻同時容忍刪節的版本被引進到自己的國家。知識分子已經被馴服到對此抱持犬儒主義的態度，上層知識菁英可以輕易閱讀完整原文，接觸第一手的現實，但國內大多數必須閱讀翻譯本的人，卻要面對另一個被過濾過的現實，這裡面有一種犬儒主義和現實主義。

全世界被捲入全球化的過程當中，逐漸被分化成兩大族群，一批是容易移動的，一批是無法移動的。可以移動的主要是資本家還有替資本家服務的知識分子，他們可站在鳥瞰的角度看到整個世界。這些具有多語能力、經濟自由，有高度移動能力的菁英可以輕易進到美國、歐洲、日本的大學，在那邊享受言論自由。如果把全球化看成全球性的階級分化，從這個角度去看，你就會發現翻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是為了那些無法動彈的絕大多數人，儘管這個時代翻譯的利潤變得愈來愈低，但在道德上卻愈來愈重要，尤其對這些多數的、被剝奪的無法移動的階層而言。

話說回來，臺灣社會學的本土化體制相對健全，所以也為社會學專門譯著創造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市場，所以群學的劉總編其實不用太悲

觀。至於臺灣的翻譯，如果國家願意資助一些好的翻譯我認為是好的。對我們而言，翻譯的意義是讓臺灣和世界更能接軌，它始終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讓一個偏僻的島嶼能夠透過翻譯接觸到全世界，希望新的世代能持續把這樣的傳統留下去。

## （二）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



圖6 顧忠華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顧：提到中世紀的氣氛，我就想到一位義大利的作者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寫過一本書《玫瑰的名字》，書中描述中世紀時期，亞里斯多德的書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再由阿拉伯文譯成拉丁文，之後就存放在教會的圖書館裡。可是當時的教會認為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觀違背《聖經》教義，所以把他的書當作洪水猛獸。教會雖然沒有把書銷毀，可是在書的邊上塗了毒藥，讀者看了之後就會中毒死掉，這樣的一個故事情節。

中世紀的宗教審判對思想控制非常嚴格，現在的中國是不是要回返到中世紀，甚至像清朝有文字獄的時代？中國大陸在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候，引進各種新的理論、各式各樣的思潮，可是現在他們好像覺得自己已經崛起了，便不再那麼好奇國外有什麼，似乎所謂的「天朝體制」比較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所以它對外界採取一種比較高姿態，或是回到過去的文化沙文主義，我認為這其實是會影響到未來全世界的發展。

剛剛講到翻譯的作用，閱讀自己熟悉的語言是很方便的，與其去閱讀外來語，不如就閱讀自己的母語，因為吸收得會更快速。所以翻譯本身的信、雅、達，我覺得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閱讀的層面非常廣。從人類有文明開始，大家都互為他者，所以一定要有翻譯，才能把人類最精

采的文明成就傳播出去，讓其他人可以一起分享。

日本人在明治維新的時候，用漢字去翻譯所有西方的醫學或各種科學現代名詞，中國的留學生用文言文去翻譯西方名詞，但最後打不過日本人翻譯的東西。我們今天「經濟學」、「社會學」或是其他白話文用的比較現代名詞，幾乎都是從日本再轉回到華文世界，這是一段漢字的奇幻旅程，造就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有一部分甚至可以歸因於他們找到（漢字）這樣翻譯的媒介。所以文字、翻譯這樣的媒介背後，促成文明的交流和進步，希望中國可以體認到，未來的這種普世價值還是一個大的潮流和方向。

曾經有人提出疑問：「國家用提倡學術為理由，用資源挹注在翻譯外來著作的計畫，會不會壓縮到民間部門？」我倒是覺得有市場失靈的問題，其實學術本身不能完全靠市場，否則難以達到公平正義的分配。政府的確要有政策或挹注一定的資源，扮演的是屬於輔助性、支撐性的角色。我們如果覺得翻譯是重要的，國家還是需要做出一些實際的動作，在品質管制上也可以維持一定的水準。我不是完全認同去國家化和去管制化，那反而成了市場至上主義。國家在社會科學的翻譯計畫上，可以強調自由、民主、人權這類主題。

### （三）把翻譯視為介入社會的行動

王：關於翻譯在教學和研究上的必要性，國科會的經典譯作是不錯的構想。但曾經有人向我抱怨，學生、甚至老師，都過度仰賴中譯本。但什麼叫做閱讀原典？有時候，我們把它戲稱是查經班式的讀書方式。其實，仔細考究文本的字裡行間，不見得適合每個學生。在當前高等教育的趨勢下，把碩士生當成博士先修班來教的傾向，可能不見得適合。於是，目前的教學不見得一定得仰靠原典。當然，有些老師會反應說，把書都翻成了中文，學生就不會讀英文版了。我對那位老師的回應是：「我再怎麼努力翻譯，也只是滄海一粟。如果能藉由中譯本來縮短學生

的閱讀理解，留出更多時間讓學生念英文材料也不錯。」

根據我對學生的觀察，課堂上拿出來的書，大多是借閱、抽印或掃描的，這種現象比起大陸譯本，對於學術譯書出版是更可怕的威脅。晚近出版界一直在談數位化的學術出版，像是 POD (Print On Demand)，但是它的前景如何，還有待觀察。剛剛也提到翻譯版本的問題，受到著作權保護影響，你即使對它不滿意，在正式場合裡也沒有辦法用別的版本來替代它。多重版本的狀況，在智慧財產權實施後，有一定程度的受限；但現在因為（兩岸）繁簡體的授權不同，有時兩邊的版本有相互參考的價值。繁簡譯本的不同，對學生而言，當然是多了選擇。對本地市場而言，一方面是出版社的存活問題，一方面是我剛剛說的，「到底是要說國語，還是說普通話？」的問題。臺灣社會出現愈來愈多的大陸語彙，不完全是壞事。但這種現象對本地學術翻譯發展自主性會有怎樣的影響，還是值得持續考察。

最後，談一談譯者主體性的問題。譯者不是一個孤零零的個體，而是存活在翻譯場域的社會關係裡。我個人的教學領域是在環境規劃，我就從規劃者角度來看。傳統上，我們在講規劃者，就是在面對政治人物和公民議決的時候，提出良好的方案、分析和解答，我們是專業的服務者。但是，比較新的對規劃專業的看法是，它不見得是接受上面交下來的既定目標，把它做出來而已，而是可以在國家和市場邏輯之外，從事公民社會的組織和動員，積極改變社會。那麼，翻譯是不是也能這樣？譯者是不是要考慮，我的翻譯到底是為了什麼？如果我們認為學術有社會責任，甚至是文化使命的話，翻譯在這個社會中，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它能促進轉化的關係是什麼？都可以深入思考。最後，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需要把翻譯當成介入社會的一種行動，以及，翻譯不可能完滿，必然充滿了問題。翻譯是「不致」（而非「不治」）之疾，是個過程，我們知其不可而為之。

#### (四) 吸引學者投入翻譯，應先給足夠的肯定 (credit)

劉：學術翻譯的困境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翻譯的主體大部分是研究生，而且幾乎都是第一次做翻譯。好不容易進入了狀況，翻譯了幾本書就畢業了，要不脫離學術圈，要不升格為教授，不再做翻譯了，出版社只好再挖掘新的研究生……這種狀況一直在循環，變成一種永續的折磨。這些新手難免會出現許多問題，如果你重視品質，這些都會反映在成本上，學術翻譯書的成本是外人難以想像的高。然而受到大眾暢銷書的影響，臺灣學術書的書價無法反映出成本。這是令人遺憾的一件事。

其次是翻譯的地位不受重視。就學術翻譯來講，臺灣的翻譯人才多在學術界，但我們的制度偏重做研究寫論文，翻譯的地位和寫教科書一樣的低落。我做出版以後，才知道要寫出一本好的教科書是何等的困難，再加上學術出版社一直都浮沉於生存線上，經驗無法累積，以至於翻譯的教科書充斥，迄今只在社會學領域出現過一本和社會接軌的本土教科書。將翻譯視同研究，給予翻譯足夠的肯定 (credit)，才能釋放出學術界的人才。我所接觸、合作過的學者，其學術成就和翻譯成就是攜手並進的，然而他們做翻譯多半是出於一種難能可貴的社會責任感。反觀日本的學術翻譯發達，學者的投入是最關鍵的因素。目前我們已經了解，教書並不比寫論文不重要，適才適性才重要，何必把學者都關在寫論文的籠子裡呢？有的學者擅長創新做研究，有的很會教書，有的有興趣於引進、翻譯學術經典，有的可能寫出教學效果特別好的教科書，多元分流的綜效可能更高更好。

最後，我希望能以學會為主體來規劃該學門的學術經典（及教科書）的翻譯。這在臺灣都是民間在做，比如群學、巨流出版社等，大學出版社是最近才出現的。這並不是很正常。學會成員對自己學門領域最熟，由他們整理出各門學術所需要的書籍，政府從旁協助及贊助，既可

掌握學門需求，又可找到最適當的翻譯人選，同時洽詢適當的出版社配合，推展的成果比較可以「看得見」，影響也深遠。但希望能先給予翻譯足夠的肯定 (credit)，否則學有專精的學者仍不會下海。

## 參、現場與會者提問及交流

提問一：就各位老師所任教的情況中，目前簡化字和正體字使用書籍的狀況比例為何？劉總編是否清楚翻譯書籍在簡化字和正體字翻譯版本的比例為何？

劉：就社會科學學術書的翻譯來講，正體字翻譯的書種大概不到簡化字的十分之一，但售價逐漸接近了。

吳：臺灣的社會科學界，表面上老師會要求閱讀英文教科書，但學生多半下有對策，民族主義會以正體字版本為主，但政治思想方面，可能就會用簡化字版本做為輔助閱讀。社會學領域的話以正體字為多，文化研究歷史哲學可能簡化字較多，主要視不同學科而定。

顧：也是需要視主題而定，我上韋伯社會學時會用臺灣譯本，因為不太可能叫學生去讀德文版。受英文翻譯版本影響，韋伯其實是被帕森斯 (Parsons) 所籠罩的，後來才有「去 Parsons 化」的主張。臺灣的翻譯水準還是比較高一點，臺灣其實在某些領域研究得很深入的話，我們反而具有主導權。中國對某些期刊論文不太講究版權，因此很多文章翻譯得很快，這部分讓學生使用是沒什麼關係，大致上還是要視主題而定。

王：當然也是看情形，環境規劃設計主要還是念英譯本居多，中文資料多為本地學者的研究，或是我個人翻譯的書籍，使用中國簡化字譯本的狀況並不多。

提問二：各位老師在翻譯社會科學書籍的過程中，是否曾經認為政府應該予以譯者或譯界何種幫助？從翻譯著作審查的角度來看，社會科學經典翻譯的「信達雅」是很抽象的概念，是否能夠有更明確清楚的標準？

顧：之前國科會的經典譯著計畫，確實稍微提昇了翻譯的地位，用政府的力量去提昇翻譯文章的學術成果，在個別的學者上可以發揮作用。由於政治社會型態接近，臺灣對於西方現代性的本質、如何演變以及問題意識等相關研究，都有優勢在。政府就該好好扶持這方面的研究，不要只想用單一化評鑑的方式，反而無法讓臺灣學者集中精力探討政治、文化、社會等現象。政府的工作應該是建構友善的翻譯環境，可以讓我們本身的優勢發揚出來。

吳：經典的譯註是文明的結晶，本身就是一個研究計畫，需要依靠集體的力量，我肯定國家願意協助有心的譯者翻譯經典，讓學界本身既有的共識決定何者為經典，國家則提供翻譯的輔助。像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有五條誓言，其中一項就是「廣求知識於世界」，他們派官費留學生出國學習，因而建立現代日本制度。民間方面，岩波文庫幾乎網羅了所有的經典，在翻譯方面有民間和官方的機制。日本的評鑑制度很人性，有可能因為好的譯本而獲得認可，日本譯者的重要角色老早在戰前就確立了，我很贊成學術人才分流，政府應該要提昇翻譯的尊嚴還有價值。

賴：其實國科會的經典譯註計畫是不能用來升等的，它只有在評鑑時才可以被視為研究計畫。劉總編提及學術界人力分流的建議，我覺得是可行的，並不需要所有老師都被綁在研究這一塊，也許國家可以討論如何讓高等教育學術（教學、研究、翻譯）人才分流。

王：我個人把翻譯當成教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國家願意投入在這一塊，學界也有很多建言，像先前師大對學術翻譯的體制，也提出了很多建議，如果能夠一一落實，那其實可以改善很多狀況。比較重要的，還是在學界的資源和人才如何投入翻譯這方面。我也一直在想，國家要怎麼更好地去幫助有熱情理念的小型出版社，尤其在翻譯學術書籍這塊，也許是國家可以思考的方向。

提問三：在現有的中國書籍審查制度下，中國的普通大學生能做些什麼？臺灣是否封鎖中國的書籍？

吳：中國並不是真正那麼封閉，現在是兩層的世界，一群是超級菁英有能力到處移動的人，另一群被留在後面 (left behind)，對底層的人來講，知識是他們能夠往上流動的唯一憑藉，但審查制度卻把知識剝奪了。世界對知識的追求受到市場商品化所傷害，我們更應該努力去維持翻譯的尊嚴，它給予我們互相聯結還有和世界聯結的重要憑藉，我們應該要把自己的知識發展到有能力分辨好壞。

顧：臺灣並沒有封鎖中國出版的書籍，中國在這樣唯物的基礎下，有可能也沒辦法管制下層人民的需求。